

温儒敏论语文教育

Wen Rumin
Lun Yuwen Jiaoyu

温儒敏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温儒敏论语文教育

温儒敏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温儒敏论语文教育/温儒敏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

ISBN 978-7-301-16374-0

I. 温... II. 温... III. 语文课-教学研究-中小学 IV. G633.3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10119 号

书 名: 温儒敏论语文教育

著作责任者: 温儒敏 著

封面设计: 奇文云海

责任编辑: 艾 英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6374-0/G · 2768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pkuwsz@yahoo.com.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2

印 刷 者: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87mm × 1092mm 16 开本 15.25 印张 300 千字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0.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目 录

前 记	1
关于语文学科的定位及其他	
——答《语文建设》杂志记者	1
中学语文是人文教育而非文人教育	
——答《语文教学与研究》杂志记者	7
中学语文改革要考虑大多数人的问题	11
语文教育:创新之路怎样走	
——答《光明日报》记者	15
让语文为孩子们一生的发展打好底子	19
“不要输在起跑线上”有误导	21
北大学生眼中的中学语文	23
北大也应当为中小学语文教育改革做点事	29
语文课改的步子稳一些为好	32
语文课改谨防“淘空”了语文	37
新课标高中语文教材的特点与使用问题	41
课改和高考的“相生”与“相克”	50
注意教学的梯度与密度等问题	55
课程改革:不能以“认知”代替“筹划”	65
评一节高中语文课	69
选修课是课改的亮点,也是难点	74
对课改应当补台,而不是拆台	78
引发鲁迅选文“减少”的争议“涉嫌炒作”	88

2 温儒敏论语文教育

经典是主食,流行读物只是冰淇淋

——答《中华读书报》记者 91

对经典的歪曲褻读是一种文化病象 95

提倡中学生读点传记 98

对《中外传记作品选读》的教学建议 100

把阅读放在首位 104

怎样看待高考作文 111

文笔不是作文教学第一要义 115

如何看待文体“套路”的练习 120

朱光潜《谈美》导读 123

大学语文:把“败坏”的胃口调试过来

——答《人民日报》记者 126

走出语文,又回到语文 128

《高等语文》编写意图及对大学语文教改的设想 130

“大学语文”教学的困扰与出路

——答《文史知识》杂志记者 136

重新唤起大学生对中国语文的兴趣 140

适合“悦读”,又启迪心智

——“大学语文”课程改革与阅读教学 143

在全国孔子学院教师培训班的讲话 161

北大传统与大学文化

——在2009年北京大学新教职工岗前培训会上的讲话 165

不能只是抱着北大的“优越主义”

——《牵梦北大:北大新生畅谈中学学习与成长》序 178

教育公平是最基本的社会公平

——就自主招生问题致北大招生办信 181

守住那种自由宽容的氛围 183

本科教育应是大学立校之本 186

纪念五四,还是要尊重“德先生”“赛先生”

——答北大学生访谈 189

我读《论语》及其他 193

我讲现代文学基础课	196
就语文教育及文学研究等问题答网友问	205
谈谈我的学术与教学生活 ——答记者问	223

前 记

我的专业不是语文教育,是现代文学史,主要精力也不在语文研究上,这方面偶有心得,时而提些看法,只能说是“敲边鼓”。如同观看比赛,看运动员竞跑,旁边来些鼓噪,以为可助一臂之力。到底效果如何,那是用不着去计较的。

这年头大学都往所谓“研究型”转,科研数据成了衡量学校与教员“水平”的主要指标,许多学校的特色渐渐消褪,师范大学也不甘心“师范”了。语文教育本是中文系题中应有之义,师范大学更应倾力研究,事实上呢,却很少有人愿意在这方面下功夫。也难怪,现今的学科体制中,语文教育的地位尴尬,甚至没有位子。尽管所有师范大学的中文系(现在全都升格为文学院了)都有一个“语文教材教法”教研室,可是人数偏少(一般不到全院教员人数十分之一),难于支持局面,老师也不安心。因为这不是独立的学科。像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语言学等等,都是二级学科,可以有硕士点、博士点什么的,唯独语文教育没有,教师晋升职称还得到教育学院去评审,在中文系这里就只能是“挂靠”。名不正言不顺,怎能让老师安心?再说学生也不太愿意学师范。全国的师范大学都在大办“非师范专业”,靠这个吸引生源或者创收,考分高的或者有钱买照顾的,都往这里奔。师范教育实际上萎缩了,这直接殃及基础教育。近几年中央领导指示一些师范大学招收免费师范生,试图改变这一状况。学生读师范不用交学费,可是要签下毕业后必须教几年中学的“卖身契”,无形中还是带有歧视。这样即使降低分数都很难招到学生,学校也不太乐意往这方面投入。师范教育“沦落”到如此地步,与之相关的语文教育当然也就没着没落的。

为什么会这样?从根上说,还是因为中小学老师的工作繁重,收入却微薄。在现在这个讲实利的社会里,没有体面的经济地位怎么能指望有社会尊重?又怎么能吸引优秀人才到基础教育这边来?优秀学生毕业了都对基础教育敬而远之,中小学教育水平自然也就难于提高。都在抱怨应试教育如何糟糕,其实教师的水平才是根本。老师有地位,才有水平,有水平就能让学生考得好,又不至于陷入应试的泥淖。这本来是常识,可是要提升教师地位好像很难很难,人们似乎就把常识给忽略了。

师范大学也无奈。他们既然不在语文教育方面多花力气,那综合大学就来凑凑热闹吧。其实像北大这样的学校,过去许多大师级学者都很重视中小学教育。他们自然不用靠这些来提高“学术分量”,主要就是出于知识者的责任。有北大传统的感召,2004年我

2 温儒敏论语文教育

提议并主持成立了北京大学语文教育研究所,得到校方以及一些校友的支持,这“边鼓”就敲起来了。果然有了一点反响,这几年全国有多所大学相继成立了类似的机构。大家重新看重语文教育了,这是可喜的一步。我想,如果相关部门能着手调整学科结构,把语文教育设定为二级学科,就做了一件实实在在的好事,对重振师范教育、提升语文教育研究的水平,肯定会大有推进。我知道做事很难,很多时候“说了也白说”,但“白说还要说”,一点一点推进吧,相信终究会有些效果的。

说语文教育研究不被重视,好像也不尽然,你看每个省都有很多语文报刊,中小学教师晋升职称,都得在上面发表文章。语文学科文章数量之多,在各个学科中是首屈一指的。但研究水平有多高?不好说。绝大多数语文方面的文章,都是什么教学法、教学模式,以及对课文的各种分析阐述之类。不能说没有用,这类文字对于上课实践还是有帮助的。可是整体而言,语文方面的文章大都是经验性的,很少依据调查作科学的数据分析,研究水平也就打了大折扣。比如,我说文言文重要,你说不见得那么重要,彼此都会有一套一套的“道理”,而且都有观点加例子。可是科学性在哪里?谁也说服不了谁。课程改革推开后,又是语文的争论最多,动不动弄到传媒到处炒作,改革的阻力非常大。语文界争议太多,跟科学思维太少恐怕有关。语文学习带有情感性、体验性,有些方面难于量化测试,但要搞清楚语文教学某些规律,要了解语文教育的某些“稳定部分”,还是可以而且应当进行科学层面的研究的。前不久我参加一个关于语文学习质量检测工具研制的会议,才知道欧美一些国家对于母语教学水平测试是多么重视,检测一个学校甚至一个地区语文教学各个环节的效果如何,他们不全依靠考试分数统计,主要靠诸多相关方面大量的数据分析,有一套可以操作的工具与模本。比如说,各个学段作业量多少为合适?影响学生学习兴趣的主要因素是什么?辅导班对学习帮助是大是小?如果例子加观点,就永远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终究是糊涂账。依靠调查跟踪分析,靠数据说话,就能得出比较令人信服的结论。类似这样的科学的研究,我们的确太少。中国之大,至今没有一个专门研究语文教学质量的检测研究机构,甚至没有这方面的专家。这只是一个方面的例子,说明我们的语文教育研究总体水平还多在经验层面打转,不能不提醒注意。

这方面我们也想敲敲“边鼓”,以改变语文教育经验性的低水平研究状况。一切先从调查着手。六年前北大语文教育研究所向全国招标,做10个调查项目,包括诸如西部农村中小学语文教师生活状况、农村中学语文课改效果、选修课实施情况、城市中学生课外阅读状况、高考命题与阅卷方式的改革,等等,要求不预设观点,尽可能较大面积调查,取得第一手数据材料,然后作出分析。我们把这叫做“非指向性调查”。目前有的项目已经结项。社会调查是个很专业的工作,光靠中文系出身的人难于做好,必须有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等学科的介入。目前我们的调查工作可能还不那么如愿,但北大语文所发起

调查,是要引起对语文教育研究科学性的重视,提升研究水准。我们自知只是“敲边鼓”,真正做好,还得靠师范大学动员多学科的专业人员投入其中。

除了调查,北大语文所还做了一件事,就是编教材。2002年高中新课标初稿出台,要编新的语文教材。人民教育出版社找到我来搭班子,我意识到这件事重要,很爽快就答应了。我们邀请著名学者袁行需教授担任主编,我和顾之川先生担任执行主编,语文所和人教社合作,负责具体的工作。我从北大邀请了十多位学者加盟,包括陆俭明、何九盈、陈平原、曹文轩、苏培成、沈阳、刘勇强、吴晓东、杜晓勤、姜涛,等等,虽然工作量大,报酬甚少,大家都还是非常认真负责地参加。这就是北大的传统。这套教材目前在全国20多个省市使用。教材力图体现新课标的精神,和以往同类教材比较,有些特色,但效果如何,特别是选修课效果怎样,还得有一段实践试验再看。我参与教材编写,花费不少精力,也学到很多东西,慢慢进入课改的状况。2006年起,我又受教育部聘请,担任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修订专家组的召集人,常到基层中小学听课,参加教师培训,感受一线教学的甘苦,了解课改的艰难,对中小学教师工作生活状况也有切身体验。收在本书中的许多文字,都和这些工作有关。

我深感在中国喊喊口号或者写些痛快文章容易,要推进改革就比想象难得多,在教育领域哪怕是一寸的改革,往往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我们这些读书人受惠于社会,现在有些地位,有些发言权,更应当回馈社会。光是批评抱怨不行,还是要了解社会,多做建设工作。我这本书很多看法不一定成熟,有些就是一时感受,但那也是有切身体验的,是真实的、建设性的。“敲边鼓”的本意,就是呼唤更多有识之士关注基础教育,关注语文教育,为社会做点实在的事情,尽知识分子的一份责任。

现将我最近几年关于语文教育的部分文字汇集在这里,包括一些讲演、访谈,内容涉及四个方面:

一是对语文教育理念与趋向的探讨。我提出语文教育不是文人教育,而是人文教育,是针对那种把语文课等同于文学课的说法,语文教学不能以培养文人、培养作家为目标。(《语文教育是人文教育而非文人教育》)我还提出“不要输在起跑线上”是错误的口号,并没有经过科学论证,几乎成为“集体无意识”了。不能让孩子人生伊始就绷紧神经参与快跑竞争。童年的“价值”不只是为将来的生活做准备,童年本身也是“生活”,而且是人生最美好的一段生活;童年如果负担太重,不快乐,就失去了人生美好的序曲,对于将来也会有负面影响的。(《“不要输在起跑线上”有误导》)

二是关于目前中小学语文课程改革的思考。我认为目前课改的效果不太乐观,原来设计的“亮点”并没有落实。但课改起码激活了问题,让我们看到现有的人才培养方式的确存在许多弊病。从国家的未来着想,必须推进课程改革,不改是没有前途的。(《对课改应当补台,而不是拆台》)我提出两个理念,一是中小学课改要“从长计议”。二是课改

4 温儒敏论语文教育

不能不正视高考问题,可以和高考“相生相克”,一起改进。我们是在高考仍然存在的前提下来进行课改的。((《课改和高考的“相生”与“相克”》))我还认为讲素质教育不能太空,其中也应当包含“生计能力”培养,素质教育是整体性的,提高了生计、生活能力,也是素质之一种。((《语文课改的步子稳一些为好》))

三是研究语文教学、特别是阅读与写作教学的方法理路。我提出在阅读教学中尊重孩子的天性,激发学生的好奇心、求知欲,培养想象力。太过功利性的阅读(主要面对考试),目标过于明确和死板的阅读要求(比如一定要求学生做笔记,或者就是为了提高作文成绩,等等),不但不能提升学生的兴趣,反而可能煞风景,扼杀读书兴趣。所谓“闲书”也不必过于强求限制,给学生一点选择的空间;要求太严格就适得其反。((《把阅读放在首位》))认为多读比多写更能有效地提高写作能力,阅读量增加,与写作水平提高是成正比的。针对写作训练中偏重文笔,提出作文教学重在文通字顺,有一定的思考内涵,然后才谈得上其他。“文笔”不是作文教学的第一要义。现在语文教学过于偏重修辞、文采,培养出来的学生思考能力、分析能力不见得好。((《文笔不是作文教学第一要义》))

四是讨论大学语文与大学文化的困扰与新路。面对目前大学语文教学的困境,提出这门课不应负担过重,主要作用就是把学生被应试教育“败坏”了的语文“胃口”给重新调试过来,然后,让他们用更多的时间去自学。既不能完全顺着中学语文的路子来学习大学语文,必须要有提升;也不能完全放开,不宜讲成一般文学鉴赏或者文化史那种类型的课。((《大学语文:把“败坏”的胃口调试过来》))

还有第五,最后一部分涉及高等教育和文学研究等多方面问题。其中认为目前我国大学普遍存在“官场化”、“市场化”、“平面化”以及“多动症”,所谓四大弊病,提出必须多讲点大学文化,当年蔡元培的树立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办学理念,理当成为北大的校训。所谓“思想库”不等于紧跟潮流,大学与世俗潮流应当保持距离。((《北大传统与大学文化》))

我的有些文章也是经验层面的,而且这些年参与课改实践,一些看法也在调整,或者可能和某些主流的意见有些距离。有不同的声音是正常的,学者的角度和管理者或其他角度有区别也不用奇怪,正好可以达到结构的平衡。我把这些“敲边鼓”的思考呈献于此,就当是和读者诸君的一次真诚对话吧。

温儒敏

2009年9月19日

于京西蓝旗营寓所

关于语文学科的定位及其他^{*}

——答《语文建设》杂志记者

所谓语文就是母语学习的课程。母语虽然内化在人的精神和思维习惯中,但这需要过程,所以母语要长期不断学习,语文素养提高是长远的事情。

现在高师教育课程设置老旧死板,既缺少理想的观照,又脱离实际,把学生限定死了,很难培养出优秀教师。

问:在讨论中学语文教育这个话题的时候,很多人会自然而然地要先作界定,考虑语文是什么,是语言文学,还是语言文字;语文作为课程又是什么。虽然中学语文教师并不关心这些问题,但它却是语文教育“理论界”的显学,请问您怎么看待这个似乎是有点矛盾的现象?

答:从研究角度说,有基本界定还是必要的。问题是研究必须回到朴素的立场,面对实际问题,而不满足于标新立异,作理论滚动。其实,对语文是什么尽管有不同说法,大家还是可以找到互相重叠的共识的部分,那就是母语学习。不会有谁反对,这就是语文的核心。从这个内核往外辐射,诸如语言、文学、文字、文化等等方面,都和母语学习紧密有关,几个方面应当是互相融合习得的。母语是语言,但不能反过来说语言就是母语。儿童习得母语是自然的过程(这也是有趣而又复杂的课题),但不是说会说话就无需学习语文了,母语的能力水平不断提高,是终生都要学习的。而母语又是必然带上特定民族文化内蕴的,学习母语,同时可以提升文化力、思想力,审美力,等等。一般讲语文是语言文

^{*} 本文为接受《语文建设》杂志记者李节的采访记录,发表于该刊2008年第2期。

2 温儒敏论语文教育

学,或者语言文字,也都不错,都能涵盖语文的主要部分,但这些概括是不全面的,所以宁可讲语文就是一种母语学习的课程,是一个非常基础性的学科。我可能又被“绕进去”了,但基本意思是在说:我们本来很熟悉、有共识的东西,不要硬去作理论分割。否则,本来大致还清楚,一较真反而糊涂了。比如什么是人、什么是文学等等,要较真,还真是很难说清楚的。这次课标修订,我主张不要抠字眼,不要纠缠概念,尤其是一线的老师,用不着去争论概念问题。理论价值的大小,归根结底要看解决实际问题的锋利程度。我并不认为“语文是什么”这个话题研究是所谓“显学”。

问:我们知道,在解放前,学习中国语言文字的课程叫做“国语”和“国文”,1948年,当时的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一律将其改称为“语文”。请问您能否设想一下,如果没有1948年的改名,还会存在“语文是什么”的讨论吗?请问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学术价值?

答:前面说了,从研究角度,讨论“语文是什么”是有其学术价值的,但不要纠缠,要面对现实。“国语”这叫法比较早,五四时期就有,那时提倡白话文,强调“文学革命”与“国语统一”合流,形成了“国语”运动。如1918年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就提出过一个口号叫“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从1920年起教育部要求当时的国民学校低年级教学都要运用语体文(白话),当时的语文课程就叫“国语”。为什么后来又有的改叫“国文”呢?是因为意识到这门课应当重点解决书面阅读问题,“国文”的叫法突出了书面阅读。至于1948年后改为“语文”,则是一种概念的梳理和统一。“语文”比前两个概念要全面、大气,可以把更多属于语文课的许多功能特征包含进去。看看历史就知道,每个时期侧重点不同,语文课程的名堂也有调整。现在有学者主张回去叫“国文”,是他们比较看重书面语学习。问题是,书面语之外的其他语文要素呢?听说读写不完全是书面语阅读。现在的争议不是改名引起的,而是看问题的层面不一样。“语文”作为一门母语课程的命名,已经在我们民族集体意识中积淀下来,约定俗成了,我看不必再纠缠争论。

问:雅斯贝尔斯在《什么是教育》中说:“一个人要精通一门学科就需要付出毕生的精力,在语言方面,则是母语。”我觉得这个观点与高中语文课程改革的某些思想有共通之处。请问您是否赞同这个观点?可否请问您,高中语文课程改革经过了六年左右的时间,您的中学语文教育思想有没有经历变化的过程?

答:我赞同。前面讨论语文概念时也已经涉及类似看法,我是主张“语文就是母语学习的课程”这一定位的。母语虽然内化在人的精神和思维习惯中,但这需要过程,所以母语要长期不断学习,语文素养提高是长远的事情。高中语文课改从第一批4个实验区开始,还不到四年,取得一定的成绩,激活了语文教学中长期存在的某些重大问题,这些问题也许还未能解决,但已经引起普遍的关注。这就是收获。我支持课改,但主张步子稳

一些,不操之过急,多从实际出发,不搞颠覆式革命。现在课改碰到的阻力太大,有些地区根本推不动,报纸上说的经验一套一套的,实际上不见得有多少改变,这也是令人担忧的。关键还是如何面对高考,以及高考如何配合课改。当然,社会层级分化形成的竞争加剧,也反映到教育中来了,课改必须推进,但每一步都将是艰难的,要从长计议。我最近有一篇讲话稿《对中小学课程改革的几点看法》,发表在上海的《语文学习》2008年第1期,其中谈到了课改应当和高考“相生相克”,是在高考不可能完全取消的前提下的渐进的改革,课改可以和高考一起改进,这是这些年我面对课改的巨大困难而产生的新的想法,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参考。

问:我们知道,工具主义语言观认为,语言是服务于思想的手段。在语文教育中,“工具性”除了可以指明必须重视知识掌握和能力培养之外,对于母语的学习是不是反而暴露出很多弊端?比如说,工具是身外之物,可以利用也可以放弃,但是,母语则早已内化在人的精神和思维习惯中。“不刻意追求语文知识的完整”、“不必进行系统的语法修辞知识教学”等要求的提出,是否已经传达出一种新语言观?请问您是否认为在语文教育研究中需要语言观的转向?

答:这个问题带较多理论性。语文课改提出工具性与人文性统一,其改革指向是防止过分和单一追求工具性,提醒人文性也不可或缺。我们知道,在过去相当长时间以来,语文课程强化政治性和教化作用,对语文基本能力包括阅读写作训练有所忽视,“文革”之后拨乱反正,逐渐转向重视工具性。应当说,这是一种进步。但后来情况又有变化,那就是应试教育严重影响了学生的人格个性发展,不利于创新人才脱颖而出,而且学生负担太重,对身心健康不利,大家都有意见。90年代中期以来许多人炮轰高考制度,强烈要求课程改革,现在的课改实际上是接续了这个趋势。显然,强调工具性与人文性结合的提法,是有针对性的,带有纠偏的意思。但不宜理解为现在课改就是强化人文性,弱化工具性,而应当是两者自然的结合,在教学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自然生成。一线老师备课不必处处考虑如何呈现人文性,显示已经在改革,实际上,人文性比较虚,它是弥漫于整个教学的。至于课标中提出“不刻意追求语文知识的完整”、“不必进行系统的语法修辞知识教学”等要求,我理解也是针对目前教学中的偏向,就是把研究界探讨的所谓语言规律特别是语法等硬搬到语文课中,以至形成以语法为中心的教学。这显然是不合适的。前面说了,语文课主要是母语学习,而说母语一般不会出语法差错,可是很多语法却反而越弄越让人不会说话了。所以课标特别提出反对追求过分的“知识完整”与“系统的语法修辞教学”。不是完全不要语法修辞知识,而是要求“随文学习”,把语感培养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至于是否提出新的语言观了,我没有深入的看法,也许还只是教学理念的变迁,不一定上升到语言观“转向”。

4 温儒敏论语文教育

问:到了高中阶段,学生的识字量、理解力和心理发展都达到了一个新水平,理应具备了一定的听说读写能力。请问在高中语文课程中,文学教育的内容是不是可以占更重要的位置?

答:我认为高中阶段的文学教育内容可以多一些,但仍然不能离开语文,是语文学习基础上的文学教育。

问:《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必修课程的系列目标之一是“阅读与鉴赏”,还规定“对文学类文本阅读的评价,是阅读与鉴赏评价的重点”。请问,您认为一个受过高中教育的人应当具有什么样的文学鉴赏水平?如果可以量化,是不是可以规定一个高中毕业生必读文学作品篇目?

答:这个问题提得好。其实我们对受过高中教育的人应当达到什么样的文学鉴赏水平,并没有科学的衡量,还只是模糊的要求。我们许多事情都是弄得有些模糊,结果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反正都是观点加例子,并没有细致科学的跟踪调查研究。像你提出的问题就是一个很细致的课题,可惜太少这样的研究。如果让课标更有科学性,更能发挥指导作用,应当有大量基础性的研究支撑。我是主张最好能拟定一个建议(不一定是必须)书目。但是这项工作非常难做。古典的书目还比较好办,许多经典作品毕竟沉淀下来了,评价和理解上有共识,而现当代因为还在“流动”,共识就比较难于达成,容易引起争议。不过,我也认为不应当无所作为,可以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提出一个建议书目。

问:您认为一个人的文学趣味有高下之分吗?高中语文教育该培养学生什么样的文学趣味?您是否认为“不培养文学家或者诗人”可以成为不进行或少进行文学教育的一个理由?

答:是有高下之分的。我们说所谓“素质教育”,其中很重要的部分,就是要用体现人类最高尚的精神与智慧的文化去熏陶青少年,文学经典因为负载着这些精神智慧,是学生人格成长最好的营养,多接触阅读,将受益无穷。目前情况下高中生为了高考,大量时间是要应对考试复习的,但也应当有部分时间用来放松“悦读”,也就是有兴趣的阅读,其中就有文学阅读。应当多读一些文学经典,除了唐诗宋词和四大名著之类,面还可以宽一点,包括外国名著和中国现当代优秀的作品,都可以读一些。近百年来很多新的东西积淀下来,也已经成为小的传统了,对当代生活影响之大,恐怕不低于古典传统,所以现当代文学也要学习。文学教育对每一位公民的培养都会有好处。“不培养文学家或者诗人”不能成为轻视文学教育的理由。读文学作品不是为了当作家,甚至也不只是为了学习写作,更重要的是人格的熏陶,是品味的提高,是生活的乐趣。

问:您在其他地方也讲到过语文课要重视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根据您的调查研究,目前高中生阅读文学作品的情况怎样?新课程实施以后,取得了哪些进步?

答:很不乐观。一是高考压力,到高二就几乎不敢看所谓“杂书”了。许多家长老师把跟高考不直接挂钩的文学作品都视为“杂书”。于是学生成天只能读教辅,做习题。这些年课改增设了选修,本意就是个性化学习,让学生多读点书,这是一个“亮点”,但实施起来非常难。当然,其中是因为有些措施难于操作,更因为高考压力有增无减,许多地区和学校不让学生来选课,或者干脆指定一两种与高考比较联系得上的,要求所有学生都要学,实际上变成必修了。所以,课改如何把先进的理念贯彻,让学生多读书,读好书,培养良好的读书习惯,还有大量要克服的困难。其次,现在是所谓影视时代、网络时代、图像时代,学生读书的时间少了,看电视、上网、读图多了。影视、网络和图像尽管扩大了接受信息的渠道,却不可能取代文字的书的阅读,尤其是文学的阅读。要让学生了解,比起其他接受方式,读书可能更有选择性,也更个人化,更需要主动性和创造性思维的介入。读书所能获得的文字的感觉,也是一般影视所没有的。同样,上网和读图,也较难获得书本阅读的那种独有的效果(网上读书也是一种文字阅读,另当别论)。所以影视网络再发达,也仍然需要书本阅读。我曾说过,就学生而言,养成阅读的兴趣与习惯,是发掘学习主动性与创造性的最重要的途径,这可能就是终生受益的好的品味,一种可以不断完善自我人格的生活方式。

问:高中阶段语文课程必修和选修的课程结构为培养学生的文学鉴赏能力提供了很大空间。您认为对文学阅读与鉴赏的考察在高考中应如何体现?另外,想顺便请问您,语文高考的改革是否与语文课程的改革同步进行?

答:高考和课改不应当是两张皮,前面说了,要相生相克,一起改进。所以我认为高考命题应当充分考虑课改的趋向,比如选修课问题,可以在高考中适当体现。文学阅读与鉴赏能力的考察也可以占一定的比重。高考与课改同步是改革方向,实际上比较难办,两个主管部门考虑问题侧重可能不太一样,这需要上级部门来协调。高考是国策,是民族习惯,承载着沉重的社会心理,马上取消不可能,改起来难度很大。况且既然高考是选拔考试,成绩总有区分度,搞得太过灵活就没有办法区分,没有办法操作。这些都是很实际的问题,身在其中才能体会,改革要推进,又要慎重。

问:在文学教育上,大学语文与高中语文是否衔接?

答:道理上应当衔接,实际上未能很好做到。这又是跟高考有关,所谓应试教育,搞到很多学生不会读作品,也不爱读作品了。所以我主张大学语文要定位在“把败坏了的胃口调试过来”,这说得可能有些极端,意思就是在有限的时间内,让学生的眼光拓展,重新引起对于母语及文化学习的兴趣,养成好的读书习惯。这些年我编了《高等语文》(江

6 温儒敏论语文教育

苏教育出版社出版)等新的教材,和通常的大学语文体例及选文都有区别,是一种尝试。

问:语文教师不可能都是文学家,对于普通语文教师而言,有没有一个“多快好省”的办法使他(她)成为培养学生文学素养的良师?

答:首先是调整好心态。现在的老师很忙,各种考核检查让人穷于应付,加上社会心态浮躁,拜金主义流行,确实难于沉下心来读书。要成为有文学素养的老师,起码要能抵制一些诱惑,有自己的精神家园,哪怕是一块不大的“自留地”。无论怎样忙,自己都能抽点时间读书,特别是读一些经典或优秀的作品。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自修,自己重新审视与学习中文专业的课程,包括研究生课程,不一定正式在职读研究生,就是定个可行的计划,自己来学习。因为已经有了教学实践,学起来会有新的心得收获,不是过去大学学习的重复。学习需要毅力,“多快好省”的办法好像还没有发现。

问:现在,“教师专业发展”在教师中特别受关注,请问您怎么看待高中语文教师的专业发展?

答:和上面谈的问题差不多。“教师专业发展”不要理解为就是适应课改,或者单纯的职业训练,要有比较长远的目标,因此,可行的中短期学习计划非常必要。当然会考虑一些实际问题,比如考级、职称晋升等等,但不要都是“直奔主题”,免得老师自己也卷入“应试教育”。培养专业兴趣与专业敏感很重要,是长期的事情。还有,就是拓宽视野,不断更新知识,不满足于现炒现卖,立竿见影,或者只关注与目前教学可以挂钩的,要在整体素质以及修养方面下功夫。现在高师教育是有问题的,课程设置太过老旧死板,既缺少理想的观照,又脱离实际,把学生限定死了,很难培养出优秀教师。所谓专业发展也是人生事业的发展,要有一点理想主义。记得年轻的时候看过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女主人公瓦西里耶夫娜教孩子们念诗,有这样一句:“向前看,别害臊,前面是光明大道!”我很为那些老师的理想与事业心所激动,这几乎成了当时我年轻时积极上进的格言。我想现在当老师也还是很需要“向前看”的精神的。

中学语文是人文教育而非文人教育^{*}

——答《语文教学与研究》杂志记者

语文课不等于文学课,人文精神不等于文人精神。语文教学不能以培养文人、培养作家为目标,连大学中文系都不能以此为目标。学语文主要是要学会表达,学会熟练准确地使用汉语。

记者:我很早就看过您的著作《新文学现实主义的流变》。在这部书里,您将新文学中的现实主义置放在世界文学发展的格局中加以考察,分辨了中国现实主义的世界背景、民族特色和历史地位。我注意到,在书中您对世界性和民族性给予了同样的重视。近年来,世界一体化和文化多元化的特点愈加明显了,我们整个社会一方面表现出了融入世界大潮的热情,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对民族特色和民族传统比较浮泛的守护意识。在负有特殊使命的中学语文教育中,您认为应不应突出民族特色、强调民族传统?如果有这样的必要,那又应当从哪些层面上体现出来呢?

温儒敏:民族特色应是语文的题中之义,中学语文要不要突出民族传统,我以为是无须设问的。语文课讲的是汉语写作,学的是汉语交际,在教和学的过程中,手段是汉语,目的是更好地运用汉语。既是汉语,就与汉民族、与中华民族紧密相联。语言最能体现民族性,语言本身就是构成民族的重要因素,因此语文课不应当也无法拒绝民族特色。

^{*} 本文为接受武汉《语文教学与研究》杂志记者孙志君采访的记录,发表于该刊2003年第8期。